**孟子“不动心”思想开放性之探赜**

**——从王阳明对于孟子“不动心”之再诠释出发**

**摘要** “不动心”作为孟子工夫论的关键，其包括“知言养气”章整体在《孟子》思想中占据相当重要的位置，而后世学者对此章亦有深度研究。本文将从王阳明对于“不动心”之再诠释出发，围绕“定者心之本体，天理也”阐述王阳明对于孟子的解读，体现“不动心”思想所蕴含的广阔解读空间；最后复归于孟子本人之“不动心”思想，揭示《孟子》“不动心”的开放性为中国哲学所遗留之丰富思想遗产。

**关键词** 不动心 知言养气 孟子 王阳明

孟子关于“不动心”的论述见诸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[[1]](#footnote-0)。孟子在这一章开篇便先提出了“不动心”的思想境界，并进一步借公孙丑之口追问“不动心有道乎”，列举了“养勇”、“养（吾）浩然之气”与“知言”等一系列方法。“不动心”之概念就字面意义清晰分明，但当孟子将这些方法加之于“不动心”之道上，却反而使得其意涵模糊不清，有待进一步通过梳理以廓清；而在对于“不动心”的解释中，王阳明巧妙地将“不动”界定为“定”，从而从“定心”层面出发强调“定者心之本体，天理也”[[2]](#footnote-1)的主张，将“知言养气”章的内容引申至其心学良知学说的探讨上。

笔者认为，正是“不动心”本身所蕴含的丰富面向使王阳明能借以阐发心学内容。因此，本文首先将探讨王阳明对“知言养气”章的理解，并展示其论述侧重点如何落实在词句之上；进一步再以王阳明为线索回归到《孟子》的文本本身，从中发掘出界定“不动心”之本质内涵。通过对孟子“不动心”与王阳明心学思想之剖析与对比，不仅能够清晰地呈现出王阳明心学在孟子基础上的发展脉络，更能深刻领悟孟子“不动心”思想在中国哲学内部后所绽放出的蓬勃生命与幽远韵响。

1. **王阳明：“定者心之本体”**

在王阳明的思想体系中，对孟子“不动心”的再诠释围绕“定者心之本体，天理也”展开，其理解深刻地融入了心学的理念，更体现了《孟子》文本的敞开性。

1. **“集义”：“不动心”之根本**

王阳明对“集义”的理解与其心学主张紧密相连，因此他“一反朱熹基于《大学》“格物致知”主张而将‘知言’置于‘不动心’工夫之根本，相反更为强调‘集义’的重要性”[[3]](#footnote-2)。他认为“集义”并非简单的积累义行，而是与“心”之本体息息相关；从心学角度看，“心”具有感知和判断事物的能力，“集义”便是这种能力在道德践行与自我修养上的体现，“集义”一词迎来了新的阐释与面向：“集义便从一描述语转化为一种积极的道德实践……与道德直觉之本心良知等修养工夫产生了紧密联系，从而牵动着整个宋明理学工夫体系的构建、展开”[[4]](#footnote-3)。他强调“心”能够洞悉行为背后的道德真意，这是因为“心”本就蕴含着天理。例如，在面对纷繁复杂的道德情境与行为选择时，常人可能被眼前利益或世俗观念所迷惑，但具有“正心”之人，凭借心之本体的天理，能迅速分辨行为的是非对错、义与不义。

正因如此，王阳明在《王文成公全书》中多次提及“集义”的重要性，并将“集义”与其学说中的重要行动“致良知”联系在一起：“君子之学，终身只是集义一事”、“故集义亦只是致良知”[[5]](#footnote-4)。如同王阳明在其人生历程中的“龙场悟道”，通过自身的心学领悟，对不同的行为抉择和道德困境进行准确判断，他不被世俗的功利或偏见所左右，而是直抵其道德核心。这种对“集义”的理解，实际上是将孟子之概念纳入到心学体系中，使得“集义”成为心学实践中塑造自我与遵循道德的一种重要方式，也为以“集义”实现“不动心”在良知学说层面上提供了可行性。

1. **“养气”：志气一体，非为主次**

从“集义”至“致良知”的理解径路出发，王阳明在解释“养气”这一中间方式时更多地出于反驳朱熹单言“养气”的需要。王阳明将“养气”与“持志”联系起来，在谈到“志至气次”时，阳明强调“志之所至，气亦至焉”，着重于志气一体，志为气之帅的理念，摒弃了将志与气分而论之且区分尊卑先后的观点。他主张“养气”与“持志”实则是同一工夫的不同路向，二者相互关联，“‘持其志’则养气在其中，‘无暴其气’则亦持其志矣”[[6]](#footnote-5)。在王阳明看来，从最为根本的层面来讲，人的存在本身就具有内在的统一性，这种统一性就必然决定了工夫也应当是一体的。无论是源于内心深处而向外生发的 “持志”，还是从外在开始而后逐步深入内里的 “养气”，它们所共同指向的最终目的都是实现心体的澄澈明晰与不断扩充。进一步深入探究，“志”源于心之所发，“故‘持志’与‘养气’又可收摄到被阳明视为复心复性工夫的‘集义’上”[[7]](#footnote-6)。因此，“养气”变成了实现的间接方式，而其实现实质也依靠“集义”，“不动心”之“道”成为了层次递进、条理分明之关系。

1. **“不动心”：“心之本体原自不动”**

从具体之道抵达“不动心”，王阳明形而上层面在诠释“不动心”更多从否定转向肯定层面抒写，即通过其“定心”概念：“定者，心之本体，天理也。动静，所遇之时也”、“心不可以动、静为体、用。动、静时也”[[8]](#footnote-7)。在王阳明的思想体系里，“定”被他径直视作心之本体的一种特质，且清晰地指出“定”这一心之本体宛如天理。动静实则是所遭遇之“时”存在差异，“时”这一概念来源于《周易》：“对‘时’的认识大抵包括……从不同角度喻示自然界、人类社会中某些具有典型意义的事理，对时间的知解和时间的运用，是时、空、物三者统一的抽象概念和行为准则等”[[9]](#footnote-8)，其涵盖了事物的内在特质与外部环境这两大范畴。从行为的外在呈现而言，能够勉强划分成动与静两类，然而从心之本体的视角出发，却不能凭借动、静来阐释。对于理学家来讲，天理是永恒存在且无动静分别的。倘若人心依照天理而有所动作，那么实则未曾动；若人心依从人欲而行动，即便进入到如槁木死灰般的状态，也不能称之为静。一旦人心依据天理去行事，内心必定是安宁稳定的，故而从根源上讲心并未真正有所动；反之，若仅仅追逐自身的欲望，即便表面上体态极为安静，甚至如同槁木死灰一般，内心也是躁动不安的，所以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静。由此可见，行为方面的动静仅仅是外在表象，内心是否安定才是衡量心体动或不动的准则，无论言语行为是动还是静，均需遵循天理，最终达成“定”的境界。[[10]](#footnote-9)

另一方面，王阳明则选择以一种更加实践的方式使用“不动心”，因此更多将“不动心”纳入其工夫论的探讨范围。王阳明曾多次在用兵之术上提及“心之不动”作为制胜法宝：“用兵何术，但学问纯笃，养的此心不动，乃术尔。凡人智能相去不甚远，胜负之决不待卜诸临阵，只在此心动与不动之间”[[11]](#footnote-10)。通过静坐、戒慎恐惧、必有事焉与勿忘勿助等工夫，王阳明将“不动心”之工夫纳入到了一种整体性的讨论中，使其不再拘泥于“知言养气”章文本提供的方式，而是构筑其思想体系中更为多元且系统的工夫路径：静坐即“静坐时心，功夫一贯”[[12]](#footnote-11)，工夫不离本体、知行和一；“不知常存戒慎恐惧之心，则其工夫未始有一息之间”[[13]](#footnote-12)，“戒慎恐惧”即“不动心”之中“动”的一面，其与静坐构成了“不动心”之中的一体两面；“必有事焉”与“勿忘勿助”则借助《孟子》其他概念深入进行关于人对本心的探讨，在这里“静坐”与“戒慎恐惧”真正达成了统一，从而实现“不动心”之境界。

通过王阳明对于“不动心”的讨论可以发现，其借用了“知言养气”章中相当多之概念以阐发自己的学说：从“养气”等其他“道”出发，汇聚于“集义”并终于达到“定心”（“致良知”）的个体状态。通过对王阳明的解读，可以发现：正是《孟子》的论述所遗留下的开放空间，使得其能够从道德修养、精神提升和心性言行等多重面向进行解读，为后世哲学家提供了丰富的思想遗产。

1. **《孟子》：“不动心”的多重面向**

“《孟子》是一部非常重要的儒家经典，在宋代理学家那里更是被称为‘圣人之心传’，与《大学》《中庸》和《论语》一同升格为‘四书’，其地位大大超过了传统的‘五经’。”[[14]](#footnote-13)而笔者认为，正是《孟子》所提供的适应性解释能力使得在后世其价值逐渐显现。在回归《孟子》“知言养气”章的文本时，会着重讨论“不动心”之说的开放性，指出其中存在的解读空间。

1. **“不动心”之内涵：处世姿态或伦理本心**

从对于“不动心”本身内涵的理解上便可窥见各派分野之端倪。就字面而言，“不动心”首先出现于“知言养气”章：“否，我四十不动心”。赵岐等人直接将“动心”理解为“恐惧”，即承接后文“北宫黝之养勇也”的工夫：“大道不易，人当畏惧之，不敢欲行也”[[15]](#footnote-14)。这是通过下文对于“不动心”的直接理解，但无法包括其他“不动心”之道，因而略显有所疏漏。一般而言，后世学者对于“不动心”的探讨主要关注两个方向：一是处世姿态，二是伦理本心。

将“不动心”理解为处世姿态是一种使得“不动心”更为具象化的方式：人被外物和自身所扰动，因此在各种具体处境之内都会表现出不同的生命状态。朱熹正是发展了赵岐的理解，认为“动心”即是“恐惧疑惑”[[16]](#footnote-15)，修正了赵岐只将“动心”对齐“养勇”，而不考虑“知言”“养气”等工夫的阐释，但依然存在相当大的解释困难：“‘恐惧疑惑’之说如能成立的话，动心与否应在行道或者霸王之业尚未完成之际来谈，似不当在公孙丑给出“不异矣”这一完全肯定的判定之后，再发‘动心否乎’之问”[[17]](#footnote-16)。另一重相对成熟的解释主要来源于二程，即将“不动心”笼统归结于平和而不受扰动的人生心境，一种“无所怒，无所喜，无所取，去就犹是，死生犹是”[[18]](#footnote-17)的状态。

而将“不动心”理解为更为抽象的伦理本心（如王阳明的论述角度），是笔者认为更有说服力的模式。一方面，“知言养气”章所有内容都纳入“不动心”此论点之下，因此“不动心”在《孟子》之工夫论层级上至少是要高于“养勇”“知言”等具体之道的。如果简单将“不动心”理解为心性平和之状态，同样没有脱离具体之道的范畴；另一方面“知言养气”章的后半部分转向了对于圣人标准的讨论，如“夫子圣矣乎”的追问、“圣人之于民，亦类也”的断言无不在说明圣人之行事准则。而单纯的心性平和无法解释子贡“学不厌，智也；教不倦，仁也。仁且智，夫子既圣矣”等要求，因此“不动心”必然包含了道德的价值内涵。“不动心”蕴含之丰裕，为后世哲学家的解读提供了广袤空间。

1. **“不动心”之外延：“四十而不惑”或“圣之事也”**

而“不动心”的外延也引发了诸多讨论，集中于该品质的境界定性。该问题起源于《论语》中孔子自我描述的文本：“吾十有五而志于学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， 六十而耳顺，七十而从心所欲，不逾矩”[[19]](#footnote-18)。正是“不动心”与“四十而不惑”的相似性引发了此类问题：“不动心”仅仅是抵达圣人境界的中间阶段，还是已臻于圣人者的重要品质？

朱熹便将“不动心”视为某种展示“四十而不惑”的中间阶段。另有学者认为“道明德立之时就能‘不动心’，并非在四十岁才能达到此境界，孔子自言‘三十而立’，乃是心已定，这已是‘不动心’之境了”[[20]](#footnote-19)。该说法有其道理，因为从儒家整体的修养进程而言，如果藉由上一步解释将“不动心”理解为心态平和之境，“不动心”确实可作为中间阶段的典型表征。此阶段之人与“不动心”状态所蕴含的在情感、欲望与外界干扰面前保持镇定从容的内涵有着高度的契合性：虽然已达到一定境界，但距离圣人的圆满仍有距离，个体尚需在道德实践、对天理人道的深刻领悟等多方面持续修行与提升。

但大部分学者依然认为“不动心”是圣人者的重要品质，更类似于孔子所述的“从心所欲不逾矩”。“不动心”并非是简单的情绪或心理状态的克制，而更是源于对宇宙万物运行规律的透彻洞悉、对至善的完美践行以及对天地责任与使命的无私担当，这才是“知言养气”章原文所传达的根本理念：“圣人复起，必从吾言矣”。“不动心”体现了圣人超越常人的精神境界与伟大品质，是《孟子》中理想人格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在精神层面的核心体现，对世人起到了垂范与引领的作用，激励后代儒家学者不断追求崇高而自由舒展的生命况味。

1. **结语**

孟子的“不动心”思想在儒家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，后世学者对其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。笔者从王阳明对孟子“不动心”的再诠释出发，剖析了王阳明将“不动心”融入心学体系的理解，如强调“集义”为根本、“养气”与“持志”一体，“心之本体原自不动”等、展示了其对“知言养气”章概念的借用与阐发。进而回归《孟子》文本以挖掘“不动心”的开放性，探讨“不动心”的内涵与外延等问题的学界争论。

笔者试图通过王阳明思想之例与“知言养气”章本身的解读，呈现出《孟子》“不动心”之开放性的伟大特点，展现《孟子》遗留的思想遗产对后世哲学的极高价值：破文字之拘囿，营精神之阆苑；倾耳以闻圣哲之洪钟大吕，会心以察贤达立世之高韵幽姿。

1. 朱熹：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3年，第229-235页。后文中原文不赘引。 [↑](#footnote-ref-0)
2. 王守仁：《王阳明全集》，吴光、钱明、董平、姚延福编校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4年，第28页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)
3. 盛宁：《由朱、王经典诠释路向试论二者关于“知言养气章”解释之差异》，《中国儒学》，2019年，第227页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)
4. 肖永明、谢川岭：《宋明理学工夫论的建构与展开——以对<孟子>“集义”的诠释为中心》，《中国哲学史》，2022年第6期，第70页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)
5. 王守仁：《王文成公全书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15年，卷一，第90页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)
6. 王守仁：《王阳明全集》，第25页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)
7. 盛宁：《由朱、王经典诠释路向试论二者关于“知言养气章”解释之差异》，第225页。 [↑](#footnote-ref-6)
8. 王守仁：《王文成公全书》，卷一，第21、39页。 [↑](#footnote-ref-7)
9. 吾淳、杨丽娟：《<易>“时”初义考——<周易>“时”观念的知识线索》，《中国哲学史》，2020年第4期，第41页。 [↑](#footnote-ref-8)
10. 陈浩然：《王阳明不动心思想研究》，呼和浩特：内蒙古大学，2023年，第33页。 [↑](#footnote-ref-9)
11. 王守仁：《王文成公全书》，卷三十八，第1691页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0)
12. 王守仁：《王文成公全书》，卷三，第114页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1)
13. 王守仁：《王文成公全书》，卷四，第179页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2)
14. 黄晟：《浅谈文本考据与义理阐发之间的张力——以历代学者对<孟子>的怀疑为例》，《文教资料》，2020年第17期，第53页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3)
15. 孟子：《孟子注疏》，赵岐注，孙奭疏，北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00年，第88页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4)
16. 朱熹：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12年，第230页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5)
17. 黄莉：《孟子“不动心”思想研究》，武汉：华中科技大学，2023年，第2页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6)
18. 程颢、程颐：《二程遗书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0年，第378页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7)
19. 孔子：《论语·为政》，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，地址：https://ctext.org/analects/wei-zheng/zhs，访问时间：2024年12月20日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8)
20. 黄莉：《孟子“不动心”思想研究》，第4页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9)